良渚・石峽文化「獸首鐲」研究

江美英
南華大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提　要

二十世紀晚期，太湖地區良渚文化瑤山遺址，以及嶺南地區石峽文化石峽遺址分別出土一種玉環，在其外緣等距離地高浮雕相同造形的動物頭。這種玉環在傳統的古器物學中被稱為「蚩尤環」，但在今日考古學界多名之為「龍首鐲」。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遺址還出土一些高浮雕相同動物頭的小玉飾、璜與圓牌，顯然與所謂「龍首鐲」的發展有關。

此後有學者分析器上高浮雕的動物頭特徵後，指出崧澤／良渚文化的這類紋飾具二元內涵，太湖東南至南部地區先民所雕並非「龍首」，而可能為「虎首」。筆者認為雖不易肯定動物頭的確定生物種屬，但這些動物頭具有短立耳、大眼、寬平鼻頭，應是獸類的共同特徵，本文乃稱之為「獸首鐲」。

本文旨在探討此類「獸首鐲」，除詳加研究考古出土玉器資料外，也略整理相關學術研究史，並論證幾件傳世「獸首鐲」的時代性與文化別。

關鍵詞：獸首鐲、龍首鐲、蚩尤環、崧澤文化、良渚文化、石峽文化

一、「獸首鐲」研究的回顧

本文探討一種特殊造形紋飾的玉環鐲，提要裡已說明過去有多種定名，但在本文中原則上稱作「獸首鐲」。隨著行文需要，有時會稱作「蚩尤環」或「龍首鐲」，但均指稱同一類玉器。

這種玉器最早見於元代朱德潤（1294-1365）所撰《亦政堂古玉圖》，記錄他在友人處看到的玉環，題名為「琱玉蚩尤環」。該書中除了載錄色澤尺寸外，並描述器表上「循環作五蚩尤形」。朱德潤認為這件玉器是當時黃帝製作指南車上所裝飾的玉器，器表浮雕五個有雙耳、大眼、鼻、口的動物頭，是當年被黃帝征服的蚩尤形象，故推定其為「真三代前物」（圖 1、2）。[1]

「蚩尤環」是現存中文資料中，這類玉器最早被記錄的器名。朱德潤推斷該玉環的製作年代應早於夏商周三代，今日考古發掘也證實這類玉環的確出於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與石峽文化。

清末收藏家端方（1861-1911）所著《陶齋古玉圖》中著錄一件相似的玉器，不過該件器緣浮雕六個動物頭。端方定名為「瓏」，描述「黃玉原形」，可惜無更多記錄（圖 3）。[2]

近年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公布一件館藏，徑達 9.8 公分（圖 4）。書中定其年代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中英文品名為「龍首紋玉手鐲，Brace with imagery」。[3] 從近似六個動物頭組合圖像觀察比對，與端方著錄的「瓏」頗相似。但核查該館登錄，並未明言此器來自端方收藏，而是由藏家自紐約購藏捐贈。[4] 不過由於端方收藏的「太保玉戈」即入藏弗利爾美術館，[5] 因此不排除

1 朱德潤，《亦政堂古玉圖》（乾隆壬申年亦政堂藏版印刷），壬申年即乾隆十七年（1752）。此版本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籍彙刊（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4-5。此書另有版本，書名為《古玉圖》而無「亦政堂」三字，見朱德潤，《古玉圖一卷》，收入《原刻景印百部叢書集成》（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據明正德沈津輯刊本影印），輯 91 冊 1；朱德潤，《古玉圖》，收入《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冊 48，頁 552。

2 端方，《陶齋古玉圖》（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來青閣景印），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籍彙刊》，頁 60。

3 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50-51。

4 Open F|S| Collections: https://www.freersackler.si.edu/collections（檢索日期 2017 年 6 月 30 日），據該館檢索系統刊載，該器編號 F1917.141a-b，是 Charles Lang Freer 於 1917 年購自紐約的 Tonying and Company，1920 年捐贈給弗利爾美術館。

5 聞廣，〈記召公太保二玉戈——古玉續談（二）〉，《故宮文物月刊》，208 期（2000.7），頁

圖 3、圖 4 可能是同一件，有待繼續追蹤探討。

1923 年，Una Pope-Hennessy 在其 *Early Chinese Jade* 一書中，著錄一件相似的玉環，直徑達 10.02 公分，當時屬 Raphael 收藏，書中定名為「RING in brown jade bearing frogs on the outer edge. Probably of the Han dynasty.（可能漢代，外緣雕青蛙紋的褐色玉環）」（圖 5）。[6] 這件器物目前典藏地不詳，它與圖 4 相比，器表均浮雕六個動物頭，散布白色沁斑，所公布的尺寸也相近，二者是否為同一件？值得追蹤研究。



圖 1　朱德潤　亦政堂古玉圖　琱玉蚩尤環



圖 2　朱德潤　亦政堂古玉圖　琱玉蚩尤環文字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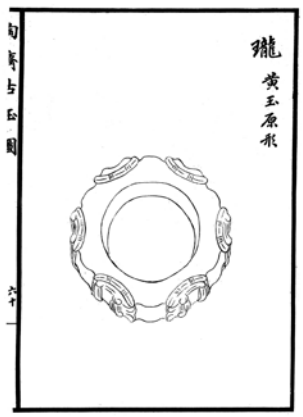


圖 3　端方　陶齋古玉圖　瓏



圖 4　弗利爾美術館藏　獸首鐲　編號 F1917.141　徑 9.8 公分





圖 5　Una Pope-Hennessy 發表的獸首鐲　藏地不詳

24-29。文中記錄弗利爾美術館藏編號為 F1917.396 與 F1919.13 二件玉戈，均曾為端方收藏。據此，筆者懷疑弗利爾美術館藏品（編號 F1917.141），可能曾經端方收藏。

6　Una Pope-Hennessy, *Early Chinese Jad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3), pl.LXI, fig.2.

目前查得清宮舊藏也有數件類似風格的獸首鐲，其中三件典藏於臺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臺北故宮」）（圖 6、7、8）。[7] 一件藏於北京的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北京故宮」）。[8]

2014 年筆者曾申請檢視臺北故宮藏品，並根據圖 6、7、8 三件的原始編號分別為：「呂 1804-79」、「雨 980」、「呂 1847-25」，核查三者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中的品名分別為：「漢玉鐲」、「瑗」、「漢玉五喜圈」。[9]《故宮物品點查報告》是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間（1925-1929）該院成立之初，由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宮中文物時所編撰，多參考當時《陳設檔》或器物上所貼黃籤的字樣定名。反映了清代至民國初年，古器物學界一般的觀點。

事實上，清代時流行將古玉泛稱為「漢玉」，乾隆皇帝曾在其御製詩的詩序與詩註裡，明白地說：「玉之古率稱漢耳。」[10]「漢玉者，非必炎劉時物。其土浸璘瑵，古色穆然者，皆可謂之漢。」[11] 換言之，清代泛稱有「土色沁斑」的古玉為漢玉。核對刻有御製詩的實物可知，即是如本文圖 6 ～ 8 三件，凡是在青黃色的玉質上分散了深淺交雜褐色的所謂「土沁斑」，[12] 在清代就可泛稱為「漢玉」。但在當時收藏者觀念裡，它們未必是漢代製作。[13]

只是清代的這種稱法，到了民國初年卻成為古玩界定名與斷代的依憑。1982 年，臺北故宮第一代專家那志良主編《故宮古玉圖錄》出版，發表本文圖 6 玉

---

7 圖 6、7 引自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155、156，圖 58、59。圖 8 引自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五）〉，《故宮文物月刊》，114 期（1992.9），頁 83。

8 故宮博物院編，徐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編．6．明》（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52，圖 27。

9 清室善後委員會編，《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北京：線裝書局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圖 6 資料見該書第 6 輯第 3 編第 4 冊，6-357：「養心殿，華滋堂，燕喜堂：呂－八〇四第 79 號，漢玉鐲」。圖 7 資料見該書第 6 輯第 3 編第 4 冊，頁 6-198：「重華宮，雨－九八〇，壽春寶盒（內有雕花匾子一件瑗一件御臨米帖小冊頁一本漢玉小鳧一件」。圖 8 資料見該書第 6 輯第 3 編第 4 冊，頁 6-365，「養心殿，華滋堂，燕喜堂：呂－一八四七條第 25 號，漢玉五喜圈（附御臨米芾尺牘一卷帶紫檀盒）」。

10 乾隆皇帝御製詩〈漢玉素璧〉的詩序。詩著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四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卷 58，頁 2-3。

11 乾隆皇帝御製詩〈題和闐漢玉蓑笠漁翁〉的詩註。詩著錄於《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御製詩三集》，卷 43，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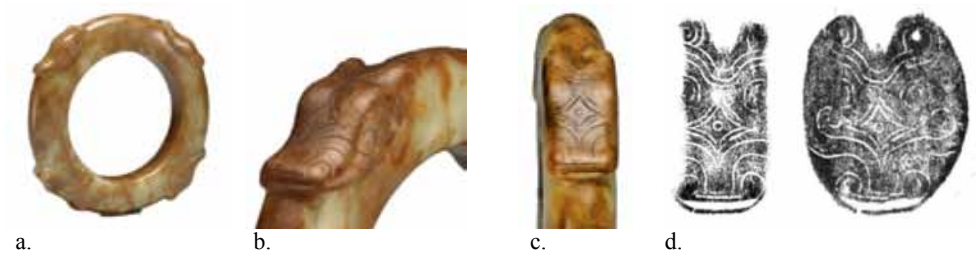
12「土沁」只是泛稱古玉在埋藏或其他原因下，因次生變化變成不透明的土黃至褐紅色。事實上，許多古玉的褐黃斑是刻意被染色的。

13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2 期（2000 冬），頁 61-116。第 86 頁中詳加討論。張麗端亦有討論，見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頁 38。

環，就定名為「漢代蚩尤環」。[14]

1986 年及 1987 年良渚文化反山及瑤山遺址發掘，1988 年簡報出版，[15] 二墓地均出土浮雕這類獸首紋的玉器。瑤山 1 號墓出土的所謂「龍首鐲」，更相似於本文圖 1、3、4、5 等。在考古新知的導引下，1989 年鄧淑蘋撰文〈由瑒子和蚩尤環談古玉鑑定的新挑戰〉，文中就將本文圖 6、圖 7 兩件玉器的製作年代提早到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16] 這觀點也發表於鄧淑蘋 1991、1992 出版的論文與專書中，[17] 惟鄧氏的三份著作均延襲舊名「蚩尤環」。

1992 年，嵇若昕發表專文〈故宮古玉輯珍（五）〉，首次發表本文圖 8，除了依據考古資料定為良渚文化，還參考瑤山考古簡報，將之改名為「龍紋鐲」。[18]



a. b. c. d.

圖 6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　獸首鐲　徑 10.75 公分　內徑 6.5 公分　高 1.6 公分　比重 2.96　硬度 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 1804-79　故玉 5665



a. b. c. d.

圖 7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　獸首鐲　徑 9.38 公分　孔徑 6.8 公分　高 1.9 公分　比重 2.92　硬度 6.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雨 980　故玉 8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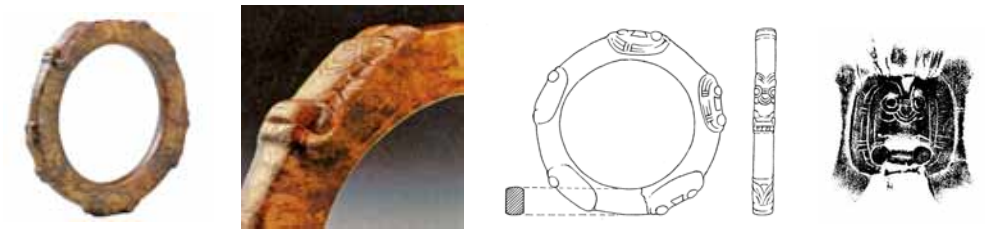
14　那志良主編，《故宮古玉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頁 120，圖 204。

1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頁 1-3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第 1 期，頁 32-51。

16　鄧淑蘋，〈由瑒子和蚩尤環談古玉鑑定的新挑戰〉，《故宮文物月刊》，71 期（1989.1），頁 36-51。

17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故宮學術季刊》，8 卷 4 期（1991 夏），頁 1-54。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頁 155、156，圖 58、59。

18　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五）〉，《故宮文物月刊》，114 期（1992.9），頁 83。



a. b. c. d.

圖 8 良渚文化 獸首鐲 外徑 8.5-8.6 公分 孔徑 6.05-6.07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呂 1847-25 故玉 4154

總之，距 1982 年《故宮古玉圖錄》的出版僅七年，因瑤山、反山遺址這類玉器的發現，學者們對這類玉環鐲的斷代，從漢代（西元前 206 年至西元 221 年）修改為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西元前 3300 至前 2300 年）。提早了二、三千年之多。

但是，臺北故宮所藏的三件中，驟視之下，似乎只有圖 8 最相似於瑤山出土的獸首鐲，其鐲體粗細得宜，外緣浮雕的五個獸首適度包覆鐲體的三個面。至於圖 6、圖 7 兩件，似乎不太像瑤山出土者。因為圖 7 鐲體外緣雖雕琢五個同方向的動物頭，但浮雕得較淺，且每兩個動物頭之間的器表，另以陰線刻繪中央有雙圈的雙層菱形紋，驟視之，好像鐲體外緣呈波浪起伏。圖 6 這件鐲體特別粗壯，比例上四個浮雕的頭向一致的獸首，顯得比例上偏小，它們不但彼此距離遠，且只能淺淺地包裹住兩側不到二分之一的器表。正因如此，在上個世紀末，大陸考古學家們對圖 6、圖 7 兩件獸首鐲的年代是否能提前到新石器時代，是帶有懷疑的；甚至認為它們根本就是乾隆皇帝時的贋品。這個疑惑一直到 2001 年石峽文化獸首鐲公布後，似乎有了解決之道。

石峽文化分布於廣東省北邊五嶺之南，石峽遺址第 42 號墓、第 99 號墓各出土一件獸首鐲。由於該地土質鹼性極強，玉鐲器表均受到嚴重腐蝕，花紋模糊不清。直到 1998 年發掘者朱非素做室內整理時，才發現兩件玉鐲器緣浮雕了動物頭，並於 2001 年公布線圖。[19] 2014 年石峽遺址的考古報告出版，分別公布彩圖與黑白圖。也大致考定石峽文化年代約西元前 2800 至前 2200 年。[20]

19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24-63。

20 石峽文化年代約西元前 2800 至前 2200 年。見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北京：文物出

筆者於 2009 年冬曾至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廣東省博物館等地檢視石峽文化出土玉器，2012 年發表〈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一文，[21] 除對石峽出土玉器中，哪些可能是良渚文化玉器，直接來自太湖地區？哪些可能是石峽文化先民所製作的仿品？作了詳實的論證辨析外，在該文中，筆者也根據石峽出土獸首鐲，論證本文圖 6、圖 7 兩件應該是新石器時代遺物，或可能與石峽文化有關。

但是，所謂「蚩尤」和「龍」，均非自然界存在的動物，先民在這些玉環鐲圓弧形外緣所浮雕的動物頭，究竟是他們心目中的什麼動物呢？

崧澤晚期一些遺址，以及良渚早期的瑤山、反山遺址，分別出土一類小玉飾、璜、圓牌等，也浮雕相似的動物頭（詳本文第二、三節之討論）。而這類紋飾盛行到良渚文化早期晚段就迅速消失。反而是所謂「神人獸面紋」（圖 9）發展成為良渚文化最主要的紋飾。方向明研究了這兩類紋飾後，認為圖 9 紋飾下半部的「獸面紋」，是由前文所說的「龍首」演變而成。他指出「龍首紋」的二立耳，後來就演變成良渚文化「獸面紋」上重圈大眼兩側斜上方的月牙形「眼瞼」。[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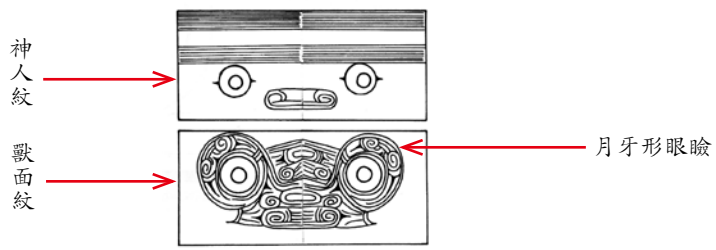


圖 9　良渚文化　神人獸面紋　刻於瑤山第 12 號墓出土玉琮上

在此一前提下，鄧淑蘋認為作為良渚文化「獸面紋」的前身，也應具有「獸」的內涵。尤其是全面檢視了太湖地區出土單體動物頭玉飾後，確定當時具有二元母題，太湖以東如趙陵山等地出土的玉飾，所雕琢的動物有長鼻吻，頭頂

版社，2014），序及頁 398。

21 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冬），頁 157-204。

22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鄧聰、吳春明，《東南考古研究》，3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0-176。方向明，《良渚文化的神人獸面像——玉器時代觀念形態和美術形式的個案研究》，收入陳光祖、臧振華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東亞考古的新發現》（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53-198。

有角或鬣，整體比較接近蛇等爬蟲類者，或可稱為「龍」；但太湖東南至南部出土的玉飾，所雕琢的動物都具有短立耳、大眼、短寬翹鼻頭的，可能是獸類中的「虎」。[23]

筆者認同這些玉飾的造形可能有兩種母題，但建議不必確指所雕動物為「虎」，宜較保守地泛稱之為「獸」，這亦是本文將圖 1、圖 3 ～ 8 稱為「獸首鐲」的主因。

行筆至此，已大致把獸首鐲這一特殊造形玉器的研究過程作了簡要回顧。筆者以為要深入探索此一問題，必須先全面研究與獸首鐲關係密切的各式獸首紋玉器，尤其是最初發展的單體獸首飾，以及器身作圓弧形或圓盤形的璜與圓牌。至於浮雕了獸首紋的管、錐形器、冠狀器等，器形與圓鐲相距甚遠。限於篇幅，本文就不多討論。

二、考古出土獸首飾

近二十餘年，在太湖流域的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陸續出土一些只有 1.2 至 3.8 公分的長方形或圓牌小玉飾，均雕有動物頭與光素彎繞的身軀。在各考古報告及相關論述中，常被稱作「小玉龍」或「龍首飾」，本文則將其中出土自浙江境內的改稱為「獸首飾」。

1996 年劉斌發表論著，認為在崧澤文化晚末期突然出現這種玉雕，是外來文化因素的入傳。[24] 從馬家浜文化到崧澤文化的陶器主要流行魚鰭形足，崧澤文化分為五期，第五期時突然出現扁鬹形足陶鼎；與陶器發生變化的同時，就是這類「獸首玉飾」的出現。劉斌認為可能是海岱地區大汶口文化或江淮地區薛家崗文化傳入所致，他也認為「獸首紋」與「神人獸面紋」（圖 9）是兩種不同的崇拜對象，[25] 認同此說的還有其他學者。[26]

---

23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14 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375-385。

24 劉斌於 1996 年以日文發表有關這類玉器的專文，見劉斌，〈良渚文化の竜首文玉器〉，收入王明達、中村慎一編，《良渚文化——中國文明の曙光》（東京：勉誠社，1996），頁 126-135。中文見劉斌，〈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器〉，收入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304-318。

25 劉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綜論》（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7），頁 131、145。

26 趙曄指出這兩種紋飾（龍首紋、獸面紋）的玉器，在良渚早期墓葬中常共存，所以應該具有不

如前所述，方向明則認為「獸首紋」就是「神人獸面紋」中下半截「獸面紋」的前身，二者是同一個崇拜對象。認同後一說法的也有其他學者。[27]

大約到 2013 年，考古出土的「獸首飾」已累積達 13 件。九件出自浙江省境內，主要分布於太湖南部的「良渚遺址群」，以及太湖東南部的「嘉興地區」。前一地區有三個遺址：餘杭官井頭、[28] 餘杭後頭山、[29] 安溪梅園里。[30] 後一地區則有四個遺址：桐鄉普安橋、[31] 海鹽仙壇廟、[32] 海寧達澤廟、[33] 海寧皇墳頭。[34]

以上二區均在浙江省境內。2014 年，該省考古所將九件浙江境內的小玉龍資料彙集出版於《崧澤之美》一書。[35] 並召開「崧澤文化學術會議」，出版論文集。[36]

太湖以東及以北的上海福泉山、[37] 蘇州昆山趙陵山、[38] 常熟羅墩，[39] 共出了四件相似玉器，但其動物頭頂具有角或鬣，鼻吻較長，不刻畫眼睛，較相似於

同的含意。趙曄，〈良渚玉器紋飾新證——官井頭幾件新穎良渚玉器的解讀〉，見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頁 243-255。

27 蔣衛東，《神聖與精緻——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7），頁 234。蔣衛東，〈天地與祖先——良渚文化玉器神人獸面紋的解讀〉，收入山東博物館、良渚博物院編，《玉潤東方：大汶口——龍山・良渚玉器文化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45。

28 趙曄，《官井頭——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個視窗》，《東方博物》，2013 年 3 期，頁 5-16。

2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餘杭文管會，〈浙江省後頭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08 年 3 期，頁 31-49，圖參頁 28。

30 梅園里資料見劉斌，〈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器〉，頁 304-318。

31 參普安橋中日聯合考古隊，〈桐鄉普安橋遺址早期墓葬及崧澤風格玉器〉，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59。

3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鹽仙壇廟的中期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頁 179，圖 19M51。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年），圖 26，王寧遠撰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197。

3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海寧達澤廟遺址的發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北京：長征出版社，1997），3 輯，頁 94-112。圖參頁 105，圖 13-6，玉徽狀飾。

34 圖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頁 206-207。此墓葬為良渚文化時期，正式報告尚未出版。《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頁 287-301 僅出版〈海寧皇墳頭〉崧澤時期墓葬資料。

3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

3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

37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福泉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 52。

38 南京博物院編著，《趙陵山：1990-1995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頁 136。

39 蘇州博物館、常熟博物館，〈江蘇常熟羅墩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9 年 7 期，頁 16-30。

一般觀念裡的龍。[40] 筆者認為或可繼續稱江蘇境內的為「龍首飾」，但它們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筆者曾撰文探討單體的獸首玉飾的演變發展。[41] 結合出土遺址的時代先後及文化別，可將獸首飾大致分為三期。整體而言，從接近長方形逐漸發展成圓形。限於篇幅，僅擇要簡述於下：

（一）第一階段獸首飾

此階段獸首飾為方形有缺口，主要流行於崧澤文化晚期。圖 10 是器身完整的一件，出於普安橋 8 號墓，筆者親自參與該次考古發掘。[42] 玉飾的獸首正面浮雕大而圓鼓的重圈眼，有明顯的眉稜，從鼻端之下，以線切割技法先橫向切出短切槽，再近 90 度轉折向上，切出長切割槽直達眼角，此一深、長有轉折的切割槽形成的缺口，可能代表獸的口部。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光素彎轉的軀體底端，鑽有一深凹槽，顯然可供插入某種長杆。這與後文將介紹的，器身中部有圓穿，可供穿繩繫掛的獸首飾很不相同。它出自墓主下肢骨旁，是否有特殊意義？值得研究。

圖 11 出自達澤廟 10 號墓墓主頭胸部位。但據觀察過實物的方向明告知，它應被切割過，所以背面齊平。但它的面部特徵與圖 10 非常相似，不排除原本造形也相同。



a. b. c.

圖 10 崧澤文化晚期 獸首飾 長 3.1 公分 寬 1.3 公分 厚 1.6 公分 普安橋出土 M8：28

40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頁 375-385。

41 江美英，〈中國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6 期（2009.6），頁 77-92。

42 筆者於 1994 年到北京大學進修，1995 年參加「普安橋中日聯合考古隊發掘」。



a. b.

圖 11　崧澤晚期至良渚早期　獸首飾　長 2.8 公分　寬 1.1 公分　厚 0.3 公分　達澤廟出土　M10：4

（二）第二階段獸首飾

此階段獸首飾的動物臉部仍呈長方，但鼻端下無切割槽，雕作首尾相連有中孔的圓形，流行於崧澤末期、崧澤良渚過渡期，到良渚文化早期都有。

四件獸首飾可列入此階段，一件出自普安橋 17 號墓墓主頭骨一側（圖 12）；一件出自仙壇廟 51 號墓墓主下巴頸部位置（圖 13），二件分別出自官井頭 65 號墓、47 號墓（圖 14、15）。這四件中只有圖 12 玉質未受沁，保持瑩潤的潔白色。學者形容：「此器龍嘴突出。凸眼相對較小，犄角亦突起表現，穿孔大且鑽孔痕跡明顯，從製玉方式和形態特點看，都比官井頭略早一些，但器形和使用方式和官井頭是一樣的」。[43] 而官井頭出土兩件（圖 14、15），發掘者認為應屬良渚文化早期遺物。[44]

筆者認為圖 13、圖 15 這二件獸首飾有值得注意的特徵，似乎在雕完眼睛等細部紋飾後，再將左右兩側邊刻意切平。讓整件器物顯得很窄。這現象也出現於臺北故宮所藏的二件藏品中（詳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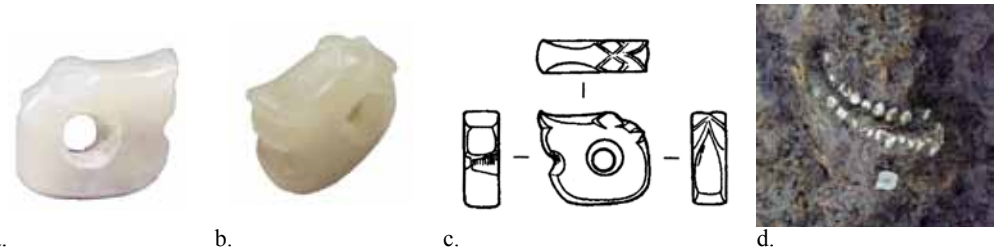
43 龍首飾分析參見普安橋中日聯合考古隊，〈桐鄉普安橋遺址早期墓葬及崧澤風格玉器〉（1996-2004）》，頁 158-159。

4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官井頭遺址崧澤文化遺存〉，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頁 341-390。簡報中官井頭 M65 和 M47 未列入崧澤文化墓葬，歸屬於良渚文化時期。



a. b. c.

圖 12 崧澤．良渚過渡期 獸首飾 長 1.2 公分 寬 0.4 公分 厚 1.1 公分 普安橋出土 M17：2



a. b. c. d.

圖 13 崧澤．良渚過渡期 獸首飾 長 1.2 公分 厚 0.4 公分 仙壇廟墓出土 M51：2



a. b.

圖 14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飾 直徑 1.6 公分 孔徑 0.7 公分 厚 0.55 公分 官井頭出土 M65：20



圖 15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飾 直徑 1.4 公分 孔徑 0.4 公分厚 0.6 公分 官井頭出土 M47：9

（三）第三階段獸首飾

此階段獸首飾之器身逐漸變成正圓，頭頂二立耳越變越小、重圈眼越變越大，面頰不再那麼窄長，鼻頭也不太翹。主要流行於良渚早期，圖 16、17、18 均屬之。



a. b.

圖 16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飾　直徑 1.4 公分　厚 0.6 公分　後頭山出土　M18：1　出於墓主頭端



a. b.

圖 17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飾　直徑 3.8 公分　孔徑 1.48 公分　厚 2 公分　皇墳頭出土　M19：6



a. b. c.

圖 18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飾　直徑 1.8 公分　孔徑 0.5 公分　厚 0.7 公分　梅園里出土　M8：23

以上簡述筆者對浙江境內出土獸首玉飾分期的觀點。

臺北故宮典藏二件獸首玉飾（故玉 6293，圖 19；故玉 6673，圖 20），[45] 雖經染色而通體呈褐色，造形紋飾仍可清楚辨識。它們器身成相連的圓形，無切割槽，但動物的臉部仍呈長方。可歸入第二階段。[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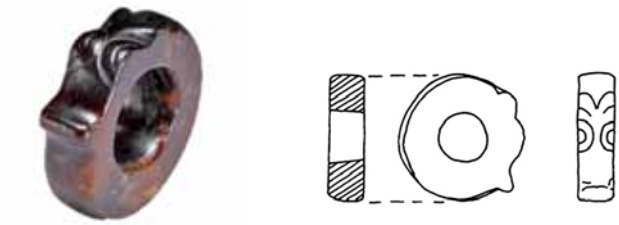


圖 19　崧澤晚期良渚早期　獸首飾　外徑 1.8-2 公分　厚 0.6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6293　呂 1846-60

45 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八）〉，《故宮文物月刊》，117 期（1992.12），頁 83。鄧淑蘋主編，《敬天格物》（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55。

46 筆者曾請教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徐琳研究員，據告該院也無真正崧澤良渚階段的小玉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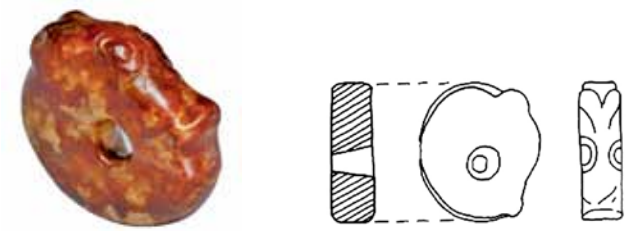


圖 20 崧澤晚期良渚早期 獸首飾 外徑 1.98-2.2 公分 厚 0.64 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玉 6673 呂 3497-29

三、考古出土獸首紋玉圓牌與獸首紋玉璜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早段（約西元前 3300-2900 年），[47] 太湖南邊發展成良渚文化最高統治中心址，有著多個重要的貴族墓葬群。其中，瑤山遺址即是一個在祭壇上有計畫地掩埋宗教人物的墓地，[48] 分南、北兩列。從隨葬品可知，南列墓主為男性，墓中多有類似「皇冠」意義的「三叉形器」、帶木柄的玉鉞（木柄已朽），以及常在手腕上套戴今日大家通稱的玉琮。[49] 北列墓主為女性，多佩戴管珠串連玉璜的項鍊，以及用成串小圓牌（或稱為「小玉璧」）連接玉璜所構成的掛飾，主要裝飾於胸腹部之上。[50]

整體而言，反山墓群比瑤山墓群稍晚，[51] 尤其是第 20、23 號墓，更是良渚早期中的晚段墓，墓中已出現大量堆疊中大形玉璧的現象。[52]

---

47 良渚文化曾分為早中晚三期，當時瑤山歸入早期、反山歸入中期。近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傾向將良渚文化只分為早晚兩期，反山被歸入早期晚段。至於絕對年代數據，尚未見公布。此處數據為筆者歸納以前學界的資料推斷。

48 參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07。

49 這時的玉琮多短矮、中孔大，四個邊壁不厚、外側器壁必作圓弧形。所以，也有學者主張將之正名為「玉方鐲」。見鄧淑蘋，〈"玉帛文化" 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 年 1 期，頁 174-188。

50 趙曄，《璜與圓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玉器組佩》，收入楊晶、陶豫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頁 320-334。

5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反山（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瑤山、反山二遺址均未測定碳 14。但秦嶺北京大學博士論文〈環太湖地區史前社會結構的探索〉中統計出「環太湖地區史前主要墓地延續時間表」。該論文尚未發表，但該表被轉引於鄧淑蘋，〈院藏良渚文化玉禮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 期（2005 秋），頁 53-109。

52 趙曄，《璜與圓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玉器組佩》，楊晶、陶豫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七）》，頁 320-334。趙曄認為這是良渚文化出現第二種禮儀制度的現象。即是除了「個人佩戴物」之外，出現了「身外標誌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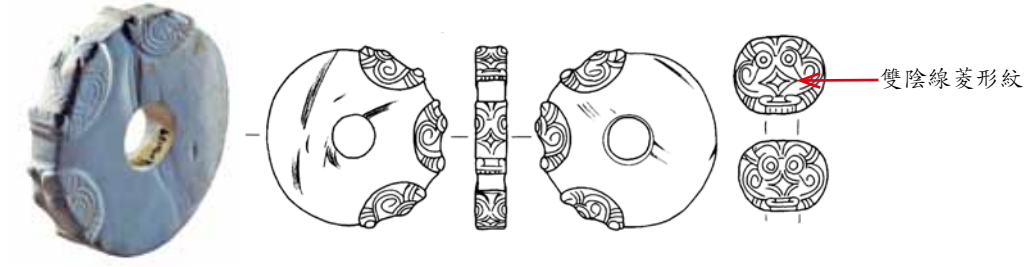
在瑤山、反山這二個墓群中，除少數例外，[53] 玉璜、玉小圓牌主要是女性用的玉器。它們多為光素，但也有的在器緣上浮雕獸首紋。瑤山第 2 號墓、第 11 號墓各出土一件獸首紋圓牌，（圖 21、22）第 11 號墓中還出有 11 件光素無紋玉圓牌。但反山第 22 號墓就同時出土六件雕有獸首紋的圓牌，排列於墓主胸腹部（圖 23、24、25）。

圖 21、22 是瑤山出土的二件獸首紋小圓牌，每件的圓弧狀外緣都浮雕三個頭向一致的獸首。但前者三獸首平均分布於器緣，後者三獸首集中分布於半個圓周上。值得注意的是，在獸的眼鼻之間，或在二個獸首之間的器表，加刻了單陰線或雙陰線的菱形紋，每一條線都不是平直的，而是微帶凹弧。這種以凹弧線構成的菱形紋可能具有特殊意涵，後文還將討論。



a. b.

圖 21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圓牌　直徑 4.1 公分　孔徑 1.3 公分　厚 1-1.5 公分
瑤山出土　M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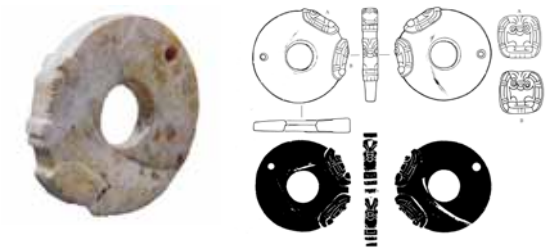
a. b.

圖 22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圓牌　直徑 4.8 公分　孔徑 1.4 公分　厚 0.6 公分
瑤山出土　M11：59

53　瑤山 2 號墓是男性墓，但出了一件獸首圓牌。即本文圖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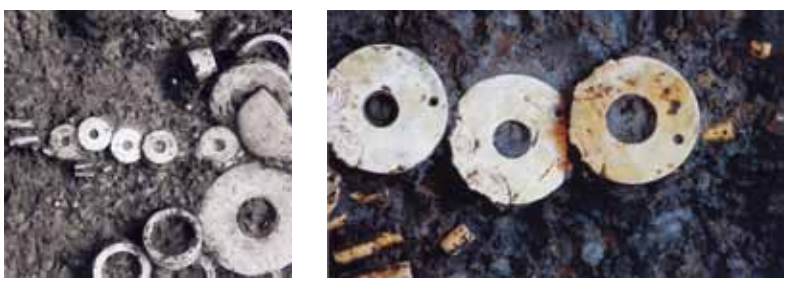


圖 23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圓牌六件 反山出土 M22：26



a. b.

圖 24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圓牌 直徑 5.2-5.4 公分 最厚 0.78 公分 孔內徑 1.55 公分 反山出土 M22：26-1



a. b.

圖 25 反山墓 22 出土六件獸首圓牌情況

迄今考古出土良渚文化玉璜甚多，但多為光素，或在器表淺浮雕神人獸面紋等。只有二件玉璜，在弧形器緣上高浮雕獸首紋，一件出於瑤山第 11 號墓（圖 26），一件出於梅家里第 10 號墓（圖 27）。[54] 瑤山出土者所浮雕的獸首，在鼻子部位也以單陰線刻繪神秘的菱形紋。



a. b.

圖 26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紋玉璜 寬 8 公分 瑤山出土 M11：94



圖 27 良渚文化早期 獸首紋玉璜 長 8.5 公分 梅家里出土 M10

54 梅家里尚未出版簡報，相關資料參文保新聞中心，〈良渚梅家里遺址發現罕見玉龍首璜〉，《人民網》http://www.wenbao.net/details.asp?id=2968（檢索日期：2009 年 6 月 5 日）。

綜合第二、三節可知，崧澤文化晚末期，在外來文化刺激下，太湖地區出現雕琢單體獸首玉飾與單體龍首玉飾。前者主要分布在太湖東南的嘉興地區與太湖南部的良渚遺址群；後者較少，主要出土於太湖東部、北部。

到了良渚文化早期早段，單體的獸首飾雖仍盛行，但興起了新的裝飾風尚，最為常見在帶圓弧輪廓的璜、圓牌的外緣，等距離地高浮雕獸首紋。這樣的玉器主要出現於女性宗教人物墓葬中，男性墓只有一例，且只出一件，原因不詳。

從瑤山、反山墓葬資料顯示，這種獸首紋玉璜、獸首紋圓牌，甚至下節要討論的獸首鐲，在當時社會中，肯定是某些特定地區的巫覡集團才能擁有的玉器。或許因此，良渚文化考古地點雖多，但似乎只有瑤山、反山兩個墓群中出現獸首紋玉器，而且在同一個墓群裡，似乎獸首紋並不具有特殊身份地位的指標。出土它們的墓，隨葬品並非特別多，墓壙也非特別大。

值得注意的是，單體獸首玉飾似乎與浮雕獸首紋璜、鐲、圓牌等，不共出於同一墓群，其原因值得追蹤探索。[55]

四、考古出土獸首鐲

迄今考古出土三件獸首鐲，一件出於良渚文化早期早段瑤山第 1 號墓（圖 28），直接戴於女性墓主右手手腕（圖 29）；另二件為出自於石峽文化早期 II 段第 99 號墓及石峽文化中期的第 42 號墓，均為二次葬。從考古學年代序列可知，瑤山墓群的年代較早，約於西元前 3300 至前 3000 年間。石峽文化的年代較晚，所以後二件應出土於不早於西元前 2800 年的地層，[56] 但不排除玉器的製作年代早於埋藏的地層年代。

圖 28 這件瑤山獸首鐲尺寸適中，孔徑 6.1 公分，適合套戴於東方成年女性手腕而不會晃晃蕩蕩。經計算可知，鐲體厚薄約 0.65 公分，外壁等距離浮雕四個獸首紋，獸頭頂有二立耳、圓鼓大眼上陰線刻繪雙圈眼，鼻部刻繪二層微帶凹弧的陰線所構成的菱形紋，菱形紋的中央又以陰線刻畫一圓圈，浮雕橫欄式寬平鼻

55 官井頭是一個跨崧澤晚期至良渚早期的遺址。資料甚多，尚未出版正式報告。已知官井頭出土二件單體獸首飾（本文圖 14、15），但出土一件浮雕獸首紋的冠狀器。但似乎未出土浮雕獸首紋的璜、鐲、圓牌等。

56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嚴文明序。

頭，左右二端各突出一圓凸，面頰也以陰線刻畫弧線。以上這些特徵均與圖 6 臺北故宮藏品相似。且二者的陰線刻畫都是粗細不勻，略帶斷續的。顯然是以手握持銳器，一刀一刀用力刻畫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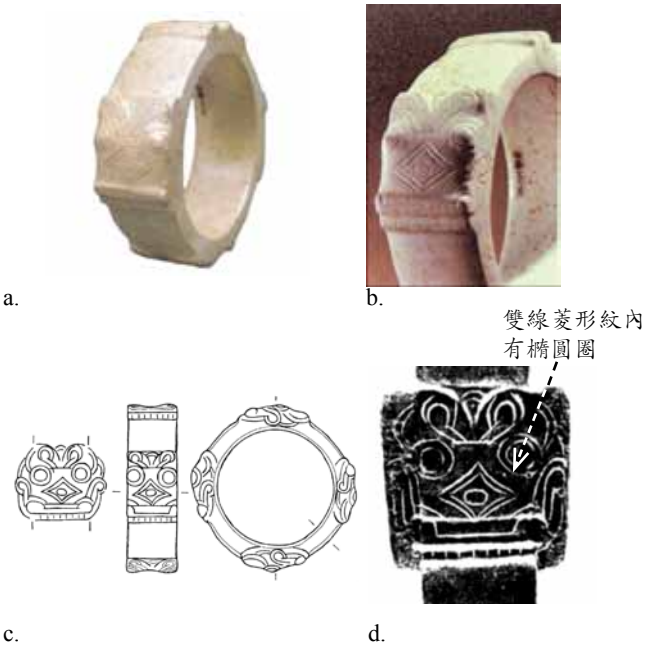


圖 28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鐲 直徑 7.4 公分 孔徑 6.1 公分 高 2.65 公分 瑤山出土 M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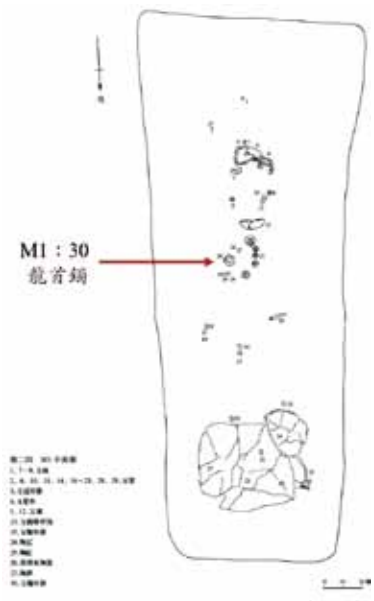


圖 29 瑤山 1 號墓平面圖 獸首鐲在箭頭指示處

石峽文化出土二件獸首鐲為便於後文討論，在本文中分別標為「石峽一號獸首鐲」、「石峽二號獸首鐲」。

本文所稱「石峽一號獸首鐲」即是第 42 號墓出土的獸首鐲（M42：4），徑 8.2 公分，孔徑 5.7 公分，高 2.1 公分。從孔徑尺寸可知，也適合套於東方成年女性的手腕，不過它器壁較厚，鐲體厚薄約 1.25 公分，故整體外徑達 8.2 公分。腐蝕嚴重，只能觀察浮雕了五個橢圓形獸首，有輪廓及鼓凸的圓眼，看不清楚其他細部紋飾（圖 30）。出土時是放置於屍骨堆上，器上還遺留硃砂（圖 31）。[57]

57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頁 277。



a. b. c. d.

圖 30　石峽一號獸首鐲　徑 8.2 公分　孔徑 5.7 公分　高 2.1 公分　石峽出土　M4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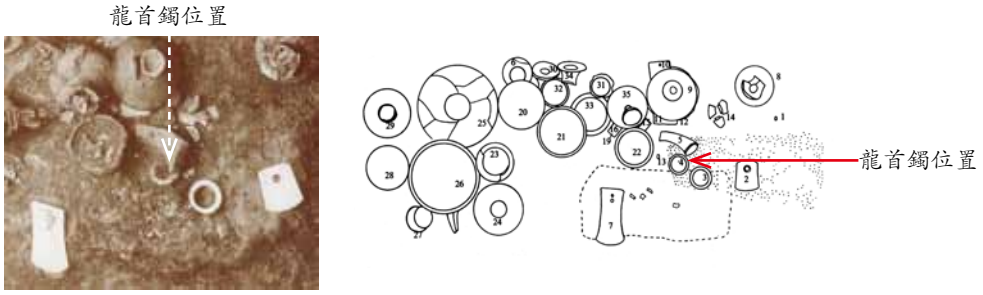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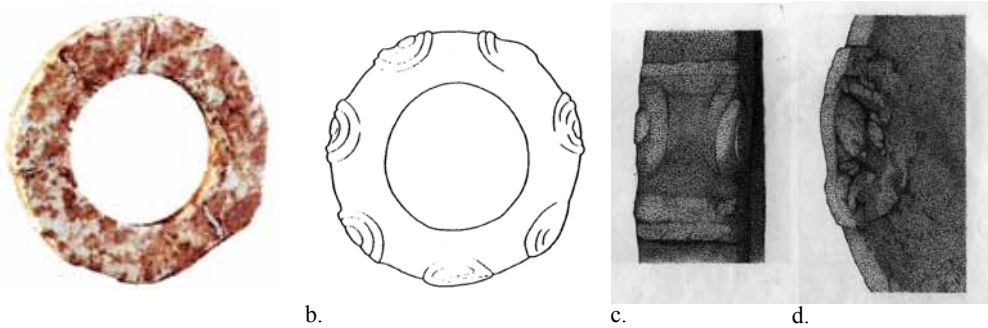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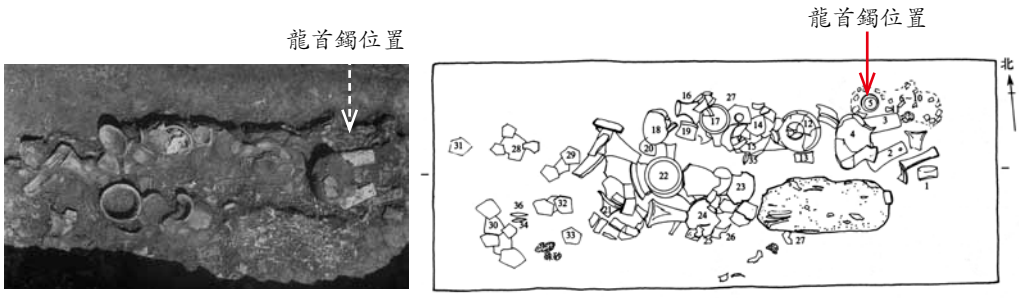
圖 31　石峽遺址 42 號墓　箭頭指示 M42：4 獸首鐲出土位置

本文所稱「石峽二號獸首鐲」即是石峽第 99 號墓出土的獸首鐲，編號 M99：5，外徑 12 公分、孔徑 7 公分、高 1.5 公分（圖 32）。孔徑適合粗壯體型的人套戴腕部。鐲體呈寬扁造形，寬約 2.5 公分，所以整體較為碩大。所以圓弧形的外緣等距離浮雕七個獸首紋，但獸首紋只包覆兩側器表的一半。雖經嚴重腐蝕，仍看得出獸首圓鼓的雙圈大眼以及如橫欄式的鼻頭，下端刻畫兩條寬平凸帶為嘴唇（圖 33）。



a. b. c. d.

圖 32　石峽二號獸首鐲　外徑 12 公分　孔徑 7 公分　高 1.5 公分　石峽出土　M99：5



a. b.

圖 33 石峽遺址第 99 號墓 箭頭指示 M99：5 龍首鐲出土位置

由於埋藏環境的差異，三件考古出土的獸首鐲器表紋飾的保存度差異大，但尺寸、器形與紋飾結構還是清晰的。以孔徑而言，石峽一號獸首鐲（圖 30）與瑤山獸首鐲（圖 28）都適合一般體型的東方成年女性套戴於腕部，鐲體呈高而薄，也是常見的鐲子造形，分別浮雕四個、五個獸首。但石峽二號獸首鐲的孔徑達 7 公分，可供較粗壯體型者套戴。鐲體呈寬扁形。浮雕了七個獸首（圖 32）。

瑤山獸首鐲受沁淺，所保存獸首的結構與紋飾最完備，共計有七個特徵，分述如下。一、橢圓的頭形輪廓線；二、短立耳；三、雙圈橢圓陰線刻畫於鼓凸大圓眼上；四、鼻梁部位刻畫內有圓圈的菱形紋；五、左右面頰刻畫線條；六、浮雕「橫檔」式寬平鼻頭；七、一排短牙。

然而，石峽二號鐲上的獸首紋，只看到第一、三、六，共三個特徵。是否有第四、五、七這三個特徵？因表面腐蝕無法確知，但似乎真的沒有第二特徵：短立耳。至於石峽一號鐲上的獸首紋，只能確定有第一、三兩個特徵。

圖 34 是石峽遺址出土玉琮，學界都認同它是石峽文化先民學習良渚文化仿作的。[58] 清楚看出眼睛、鼻頭、臉頰上刻弧線的特徵，雖與圖 32c、32d 石峽二號獸首鐲上的花紋不是一模一樣，但都是運用浮雕及陰線刻繪的技法製作，基本紋飾概念也很相似的。換言之，不能排除石峽先民能自製獸首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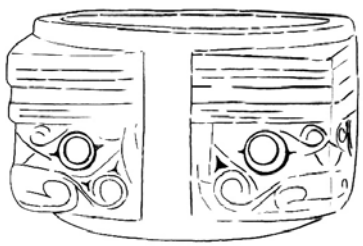
58 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冬），頁 157-204。



a.



b.



c.

圖 34　石峽文化　玉琮　高 4.4 公分　邊長 6.7 公分　孔徑 5.6 公分　石峽出土 M17：13

發掘者朱非素曾對前述現象提出她的看法。她認為石峽文化中出現良渚風格的玉器，文化因素肯定來自良渚，但有些玉器看起來既不像是原裝輸入，也不可能由良渚人到遙遠的石峽來製作，她推測可能是石峽文化的使者們到太湖地區，隨著良渚先民學習玉石製作工藝後，回到石峽再製作的。[59] 至於，為什麼石峽的獸首鐲比良渚的同類玉器顯的碩大呢？她認為或可能石峽人製作獸首鐲時作了發揮和創造；但也可能良渚文化中也有碩大的龍首鐲，只是還沒被考古學家發掘到。[60]

換言之，圖 30、32 兩件出自石峽的獸首鐲，是石峽文化先民自製的可能性頗高。但浙江及廣東的考古學者，與筆者討論時則認為應是良渚文化圈製作傳到石峽地區。故也不排除是良渚人製作，這些推論則仍有待新出土考古資料解謎。

五、傳世獸首鐲的探討

深入探索出土獸首紋玉器後，再檢視圖 6、7、8 三件傳世的玉鐲，就有了新的感受。從局部圖片可看清圖 6、7、8 三件獸首紋上刻畫的都是斷續、粗細不均

59　參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頁 34。
60　參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頁 34。

勻的陰線。這與下面要檢視的圖 38 玉鐲的刻紋完全不同。

上節已列舉瑤山出土獸首鐲（圖 28），器上浮雕的獸首共有七個特徵，在表一中我們將瑤山獸首紋的拓片與圖 6、7、8 三件獸首鐲的拓片相比，發現圖 6、7 兩件各具有六個特徵，圖 6 缺少成排牙列，圖 7 缺少立耳。但圖 8 這件原本被大陸考古學家最認同的玉鐲，獸面紋卻只具有五個特徵，缺菱形紋以及面頰上的陰線紋外，它的立耳也較短而不明顯。[61]

表一　四件玉鐲獸首紋比較

			
瑤山獸首鐲拓片（圖 28d）	臺北故宮獸首鐲拓片（圖 6d）	臺北故宮獸首鐲拓片（圖 7d）	臺北故宮獸首鐲拓片（圖 8d）
共具七項特徵：一、橢圓的頭形輪廓線；二、短立耳；三、雙圈橢圓陰線刻畫於鼓凸大圓眼上；四、鼻梁部位刻畫內有圓圈的菱形紋；五、左右面頰刻畫線條；六、浮雕「橫檻」式寬平鼻頭；七、一排短牙。	共具六項特徵：一、橢圓的頭形輪廓線；二、短立耳；三、雙圈橢圓陰線刻畫於鼓凸大圓眼上；四、鼻梁部位刻畫內有圓圈的菱形紋；五、左右面頰刻畫線條；六、浮雕「橫檻」式寬平鼻頭。	共具六項特徵：一、橢圓的頭形輪廓線；三、雙圈橢圓陰線刻畫於鼓凸大圓眼上；四、鼻梁部位刻畫內有圓圈的菱形紋；五、左右面頰刻畫線條；六、浮雕「橫檻」式寬平鼻頭；七、一排短牙。	共具五項特徵：一、橢圓的頭形輪廓線；二、短立耳；三、雙圈橢圓陰線刻畫於鼓凸大圓眼上；六、浮雕「橫檻」式寬平鼻頭；七、一排短牙。
七項特徵全	缺牙	缺耳	缺菱紋、弧線、耳短

前文多次提到以四條略帶內凹陰線形成的菱形紋，可能具有重大意義。前文已列舉四件瑤山玉器中刻有這種菱形紋：圖 21、22 獸首紋圓牌，圖 26 獸首紋璜，圖 28 獸首紋鐲。圖 23 ～ 25 是反山出土的六件圓牌，圖片不甚清晰。經詳查反山考古報告，這六件中有五件圓牌，在獸首的鼻梁部位刻有菱形紋。顯然，「菱形紋」在良渚早期時，就具有特殊的意義了，瑤山、反山的貴族都使用此一特殊符號。

61 圖 8d 從拓片上看不出刻有牙列，但圖片中明確有。

發展到良渚文化晚期時，菱形紋還具有神秘的通神法力。良渚晚期的大璧、高琮上，或刻畫極輕淺的，類似通神密碼的符號。[62] 臺北故宮所藏的一件高達 47.2 公分高琮上，有一個單獨的符號就是這種菱形紋。[63] 此外，菱形紋也常刻在良渚晚期流行的「鳥立祭壇」符號中。如圖 35、36、37 這三個「鳥立祭壇」符號，在祭壇內刻畫一隻展翅飛鳥，鳥背上都有圓太陽，太陽的內部各有一個以凹弧線構成的菱形紋。[64]



圖 35　良渚文化晚期　鳥立祭壇刻符　刻於吉美博物館藏玉琮



圖 36　良渚文化晚期　鳥立祭壇刻符　刻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璧



圖 37　良渚文化晚期　鳥立祭壇刻符　刻於藍田山房藏玉璧的器表

瞭解了菱形紋的重要性，再端詳圖 6b、6c，圖 7b、7c，在獸首紋鼻梁部位菱形紋的線條雖然是斷續的、粗細不一的，但整體紋飾仍是謹然有序，我們似乎可以感受當初先民刻繪時，心中是非常虔誠的。

最後我們檢視一件北京故宮收藏，也是清宮舊藏的玉鐲，通體深染成褐紅色

62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10 卷 3 期（1993 春），頁 1-50。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收入宋文薰、許倬雲、李亦園、張光直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臺北，南天書局，2002），頁 123-145。

63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頁 1-50。

64　圖 35 引自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頁 3，圖 1。原圖出自 Giesler, G., La Tablette Tsong du Tcheou-Li, *Archeologique, Cinquieme Serie, Tome II* (Paris, 1915)。圖 36 引自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頁 16，圖 11。圖 37 引自鄧淑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臺北：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頁 92。

（圖 38）。[65] 它的尺寸與圖 6、7、8 三件相彷彿，在圓弧器緣上等距離高浮雕五個相同的橢圓形裝飾單元。但每個單元雕琢的不是動物頭，而是以接近等粗的凸弦紋圍繞橢圓輪廓，再於內部琢飾可能模仿自商周銅器的「雲雷紋」等，這樣的紋飾應該是玉工腳踏琢玉機，利用旋轉的鉈具與濕潤的解玉沙製作的。推測製作這件玉鐲的玉工，可能見過真正的良渚文化獸首鐲，但不詳其文化內涵，所以製作出似是而非的仿贋品。只是，可能這類看似古物的作品，已很能滿足十六、十七世紀的收藏家了。



a. b.

圖 38 明晚期 仿古獸首鐲 徑 10.1 公分 孔徑 6.5 公分 厚 1.1 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六、小結

良渚文化與石峽文化的交流，兩個文化玉器的同與異，是史前考古上，糾結多年，雖有人關心，卻乏人深入整理的項目。其中，「蚩尤環」、「龍首鐲」、「獸首鐲」也是一個考古學界裡乏人問津的課題。

筆者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曾參與普安橋遺址發掘工作，該處就出土年代最早的單體獸首玉飾（圖 10、12），引起我特別的關注，曾撰文分析之。2009 年起，筆者多次前往廣州、石峽，仔細檢視石峽文化出土玉器，在朱非素研究員熱心指導下，設法梳理出如何分辨良渚文化、石峽文化玉器的規律。[66] 2014 年，筆者出

65 故宮博物院編，徐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編．6．明》，頁 52，圖 27。

66 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冬），頁 157-204。

席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召開的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開始認真研究所謂「蚩尤環」、「龍首鐲」及相關問題，本文是多年來逐步梳理資料、思考問題的階段性成果。

經過深入的探索，筆者發現即或在良渚文化早期，可能同一個文化圈裡，就存在不同的小社團。譬如：雕琢單體獸首玉飾的，就與雕琢獸首紋圓牌、鐲、璜等，可能是不同的團體？同樣雕琢獸首紋的瑤山與反山先民，作品也是大同之中又有小異。

筆者原本只擬整理考古出土器，但有機會檢視了臺北故宮藏品，才試圖整理傳世器，收集了一些早年出版品上的資料，作了簡單的學術史回顧。未料到仔細分項對比梳理後，所得出的初步答案卻是，圖 8 這件原本最受到大陸考古學家肯定的獸首鐲，只有五項特徵與瑤山獸首鐲相同，原本受到懷疑的圖 6 與圖 7 兩件，卻各有六項特徵與瑤山獸首鐲一樣，經分析比對說明此二件器物為新石器時代。這一紋飾細部對比研究的結果，或可給我們一個啟示：「直觀」常被誤導，「細審」或許是發現真相的不二法門。

所以考古學家趙曄說道：「當我們看到流散的傳世良渚玉器時，千萬不可因造型不尋常就貿然否定，而要從材質、工藝、紋飾、功用、改製與否、受沁程度、保存環境等多方面綜合考察。」[67] 的確是很正確的觀點。

〔後記〕本文承廣東省、浙江省相關考古單位及博物館先生們提供寶貴資料意見，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修改建議，謹申謝忱。

67 趙曄，〈良渚玉器紋飾新證——官井頭幾件新穎良渚玉器的解讀〉，收入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六）》，頁 243-255。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元）朱德潤，《亦政堂古玉圖》，乾隆壬申年，亦政堂藏版印刷，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籍彙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清）清高宗，《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冊 10，收入《御製詩五集》，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6。

（清）端方編，《陶齋古玉圖》，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來青閣景印。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籍彙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

近代論著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福泉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3 輯，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頁 170-176。

方向明，〈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編，《嶺南考古研究》，7 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頁 55-65。

方向明，《良渚文化的神人獸面像——玉器時代觀念形態和美術形式的個案研究》，收入陳光祖、臧振華主編，《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東亞考古的新發現》，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53-198。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7．江蘇》，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

朱非素，〈試論石峽遺址與珠江三角洲古文化的關係〉，收入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十周年文集》，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頁 24-63。

江美英，〈中國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6 期，2009 年 6 月，頁 77-92。

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年冬季，頁 157-204。

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 THE JADE AGE 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

那志良主編，《故宮古玉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南京博物院編著，《趙陵山：1990-1995 年發掘報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院編著，《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香港：兩木出版社，1989。

浙江省文物局，《良渚玉器》，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1996。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海寧達澤廟遺址的發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學刊》，3 輯，北京：長征出版社，1997，頁 94-1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頁 1-3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餘杭瑤山良渚文化祭壇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 期，頁 32-5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反山（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餘杭文管會，〈浙江省後頭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南方文物》，2008 年 3 期，頁 31-49。

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五）〉，《故宮文物月刊》，114 期，1992 年 9 月，頁 83-86。

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八）〉，《故宮文物月刊》，117 期，1992 年 12 月，頁 60-61。

嵇若昕，《故宮文物菁華百品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張麗端，〈從「玉厄」論清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故宮學術季刊》，18 卷 2 期，2000 年冬季，頁 61-116。

張麗端，《宮廷之雅——清代仿古及畫意玉器特展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7。

聞廣，〈記召公太保二玉戈——古玉續談（二）〉，《故宮文物月刊》，208 期，2000 年 7 月，頁 24-29。

楊式挺，〈廣東史前玉石器初探〉，收入鄧聰主編，《東亞玉器》，冊 1，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1998，頁 304-315。

趙曄，《官井頭——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個視窗》，《東方博物》，2013 年 3 期，頁 5-16。

趙曄，〈良渚玉器紋飾新證－官井頭幾件新穎良渚玉器的解讀〉，收入楊晶、蔣衛東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頁 243-255。

趙曄，《璜與圓牌：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玉器組佩》，收入楊晶、陶豫執行主編，《玉魂國魄：中國古代玉器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頁 320-334。

劉斌，〈良渚化の竜首文玉器〉，收入王明達、中村慎一編，《良渚文化——中國文明の曙光》，東京：勉誠社，1996，頁 126-135。

劉斌，〈良渚文化龍首紋玉器〉，收入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304-318。

劉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綜論》，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07。

鄧淑蘋，〈由瑚子和蚩尤環談古玉鑑定的新挑戰〉，《故宮文物月刊》，71 期，1989，頁 36-51。

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故宮學術季刊》，8 卷 4 期，1991 年夏季，頁 1-54。

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

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10 卷 3 期，1993 年春季，頁 1-50。

鄧淑蘋，〈刻有天象符號的良渚玉器研究〉，收入宋文薰、許倬雲、李亦園、張光直主編，《石璋如院士百歲祝壽論文集——考古．歷史．文化》，臺北，南天書局，2002，頁 123-145。

鄧淑蘋，〈院藏良渚文化玉禮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1 期，2005 年秋季，頁 53-109。

鄧淑蘋主編，《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

鄧淑蘋，〈探索崧澤——良渚系“龍首飾”〉，收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2014 崧澤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 375-385。

鄧淑蘋，〈“玉帛文化”形成之路的省思〉，《南方文物》，2018 年 1 期，頁 174-188。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韶關市曲江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蘇州博物館、常熟博物館，〈江蘇常熟羅墩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9 年 7 月，頁 16-30。

文保新聞中心，〈良渚梅家里遺址發現罕見玉龍首璜〉，《人民網》http://www.wenbao.net/details.asp?id=2968，檢索日期：2009 年 6 月 5 日。

Pope-Hennessy, Una. *Early Chinese Jad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3.

圖版出處

圖 1　璁玉蚩尤環。圖版取自朱德潤，《亦政堂古玉圖》（乾隆壬申年亦政堂藏版印刷），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集彙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4。

圖 2　璁玉蚩尤環文字說明。圖版取自朱德潤，《亦政堂古玉圖》（乾隆壬申年亦政堂藏版印刷），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集彙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5。

圖 3　瓏，圖版取自端方，《陶齋古玉圖》，民國二十五年上海來青閣景印，收入那志良輯，《古玉圖集彙刊》，臺北：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60。

圖 4　獸首鐲，弗利爾博物館藏。圖版出自江伊莉、古方，《玉器時代：美國博物館藏中國早期玉器》，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頁 50-51。

圖 5　Una Pope-Hennessy 發表的獸首，藏地不詳。圖版取自 Una Pope-Hennessy, *Early Chinese Jades*, New York: Frederick A. Stokes Company, 1923. pl. LXI, fig.2.

圖 6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獸首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a、b、c 圖版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d 圖版取自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故宮學術季刊》，8 卷 4 期，1991 年夏季，圖 27b。

圖 7　良渚文化或石峽文化，獸首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a、b、c 圖版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d 圖版取自鄧淑蘋，〈故宮博物院所藏新石器時代玉器研究之四——裝飾品類〉，《故宮學術季刊》，8 卷 4 期，1991 年夏季，圖 28b。

圖 8　良渚文化，獸首鐲，國立故宮博物院藏。a、b 圖版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c、d 圖版取自嵇若昕，〈故宮古玉輯珍（五）〉，《故宮文物月刊》，114 期，1992 年 5 月，頁 83、84。

圖 9　良渚文化，神人獸面紋。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 23。

圖 10　崧澤文化晚期，獸首飾，普安橋出土（M8：28）。a 圖版取自鄧聰主編，《華夏第一龍展覽圖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2012，頁 11；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200；c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桐鄉普安橋遺址早期墓葬及崧澤風格玉器〉，《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45，圖 6。

圖 11　崧澤晚期至良渚早期，獸首飾，達澤廟出土（M10：4）。a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198。b 圖版取自劉斌，〈良渚文化の竜首文玉器〉，收入王明達、中村慎一編，《良渚文化——中國文明の曙光》，東京：勉誠社，1996，頁 128，圖 6。

圖 12　崧澤・良渚過渡期，獸首飾，普安橋出土（M17：2）。a、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

頁 204、205；c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桐鄉普安橋遺址早期墓葬及崧澤風格玉器〉，《浙北崧澤文化考古報告集（1996-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49，圖 7。

圖 13 崧澤．良渚過渡期，獸首飾，仙壇廟出土（M51：2）。a、b 圖版取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 26。c 圖版取自〈海鹽仙壇廟的中期遺存〉，《浙北崧澤文化考古报告集（1996-2014）》，北京：文物出版社，頁 179，圖 19。d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197。

圖 14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飾，官井頭出土（M65：20）。a. 圖版取自趙曄，《官井頭——大雄山丘陵史前文化的一個視窗》，《東方博物》，2013 年 3 期，頁 14，圖 20。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208。

圖 15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飾，官井頭出土（M47：9）。圖版取自《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208。

圖 16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飾，後頭山出土（M18：1 出於墓主頭端）。a、b 圖版取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 62。

圖 17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飾，皇墳頭出土（M19：6）。a、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206、207。

圖 18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飾，梅園里出土（M8：23）。a 圖版取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 64；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崧澤之美——浙江崧澤文化考古特展》，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頁 209。c 圖版取自劉斌，〈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器〉，收入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鑒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頁 308，圖 5-1。

圖 19 崧澤晚期良渚早期，獸首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鄧淑蘋主編，《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55。

圖 20 崧澤晚期良渚早期，獸首飾，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鄧淑蘋主編，《敬天格物——中國歷代玉器導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1，頁 55。

圖 21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圓牌，瑤山出土（M2：17）。a 圖版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省文物研究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95；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圖 42。

圖 22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圓牌，瑤山出土（M11: 59）。a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館，《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香港：兩木出版社，1989，圖 217。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58，圖 198。

圖 23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圓牌，反山出土（M22：26）。圖版取自中國國家博物館、浙江

省文物研究所編，《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 292。

圖 24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圓牌，反山出土（M22：26-1）。a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反山（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326，彩圖 1010。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反山（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284，圖 231。

圖 25 獸首圓牌，反山出土。a、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反山（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 317，彩版 979、980。

圖 26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紋玉璜，瑤山出土（M11：94）。a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98，彩圖 470；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157，圖 159。

圖 27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紋玉璜，梅家里出土（M10）。圖版取自 http://www.wenbao.net/details.asp?id=2968，檢索日期：2009 年 6 月 5 日。

圖 28 良渚文化早期，獸首鐲，瑤山出土（M1：30）。a 圖版取自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5，圖 118；b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博物館，《良渚文化玉器》，北京：文物出版社、香港：兩木出版社，1989，頁 79，圖 103；c、d 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8、29，圖 26、27。

圖 29 瑤山 1 號墓平面圖。圖版取自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瑤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 27，圖 24。

圖 30 石峽一號獸首鐲，石峽出土（M42：4）。a 圖版取自 鄧聰編，《東亞玉器》，冊 3，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中心，1998，彩圖 159；b 圖版取自廣東省博物館編，《嶺南印記——粵港澳考古成果展》，廣東：嶺南美術出版社，2014，頁 129；c 圖版取自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年冬季，頁 183，表 17；d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278，圖 258-3。

圖 31 石峽遺址 42 號墓。a 圖版取自鄧聰編，《東亞玉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中心，1998，冊 3，圖 141；b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57，圖 189。

圖 32 石峽二號獸首鐲，石峽出土（M99：5）。a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圖版 34-1。b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

（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157，圖 141；c、d 圖版取自江美英，〈廣東出土良渚式雕紋玉石器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0 卷 2 期，2012 年冬季，頁 183，表 16-b 鄭楚玄先生繪圖。

圖 33 石峽遺址第 99 號墓。a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彩版 15-1；b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頁 279，圖 259-4。

圖 34 石峽文化，玉琮，石峽出土（M17：13）。a、b 圖版取自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東博物館、廣東韶關市曲江區博物館編著，《石峽遺址：1973-1978 年考古發掘報告（下）》，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彩版 12-1、12-2；c 圖版取自方向明，〈石峽文化相關玉器基本資料之補充〉，廣東省珠江文化研究會嶺南考古研究專業委員編，《嶺南考古研究》，7 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頁 58。

圖 35 良渚文化晚期，鳥立祭壇刻符，刻於吉美博物館藏玉琮。圖版取自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10 卷 3 期，1993 年春季，頁 3，圖 1。

圖 36 良渚文化晚期，鳥立祭壇刻符，刻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玉璧。圖版取自鄧淑蘋，〈中國新石器時代玉器上的神秘符號〉，《故宮學術季刊》，10 卷 3 期，1993 年春季，頁 16，圖 11。

圖 37 良渚文化晚期，鳥立祭壇刻符，刻於原藍田山房藏玉璧的器表。圖版取自鄧淑蘋，《藍田山房藏玉百選》，臺北：年喜文教基金會，1995，頁 92。

圖 38 明晚期，仿古獸首鐲，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版取自故宮博物院編，徐琳主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玉器編．6．明》，頁 52，圖 27。

A Study of "Beast-Head Bangles" of the Liangzhu and Shixia Cultures

Chiang, Mei-yin
Nan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and Design

Abstract

During the latter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kind of jade "huan" ring was unearthed at Yaoshan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in the Taihu region as well as the site of Shixia for the Shixia Culture in the Lingnan area. These jades feature identical animal heads carved in high relief along the outer edge. In the traditional study of Chinese antiquities, this type of jade ring has been called a "chiyou huan." However, modern archaeology often refers to it as a "dragon-head bangle (zhuo)." Some small jade pendants, "huang" discs, and round plaques with identical animal heads carved in high relief have also have been excavated from sites associated with the late Songze and early Liangzhu Cultures. They are obviously related to these so-called "dragon-head bangles."

However, some scholars after analyzing these animal heads carved in high relief on the jades have pointed out the dual nature of this kind of decoration in the Songze and Liangzhu Cultures. They point out that inhabitants of the south to southeast Taihu region did not carve "dragon heads" but perhaps "tiger heads" instead.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although difficult to ascertain which kind of animal head is being portrayed, these heads have short straight ears, large eyes, and a flat snout, features which are common to several beasts. For this reason, the present study refers to this object as a "beast-head bangle."

The present study not only examines in detail archaeologically excavated jades but also briefly treats related research to discuss the period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of several surviving "beast-head bangles."

Keywords: beast-head bangle, dragon-head bangle, "chiyou" ring, Songze Culture, Liangzhu Culture, Shixia Culture

(Translated by Donald E. Brix)